

文化遗产地

社区旅游增权的理论与实践

Wenhua Yichandi

Shequ Lüyou Zengquan de Lilun yu Shijian

王会战◎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科技大学博士启动金项目（2016QDJ 001）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7M623097）资助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6J K1472）资助
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8KRM056）资助
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8Z076）资助

文化遗产地社区 旅游增权的理论与实践

王会战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理论与实践 / 王会战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643-6613-1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化遗产—社区—旅游业—研究 IV. ①F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7333 号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理论与实践

王会战 著

责任编辑 罗爱林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印张 15.75 字数 249千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1月第1次

印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643-6613-1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21楼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定价 6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作者简介

王会战（1976—），男，河南孟津人，青岛大学管理学硕士，西北大学管理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现为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旅游增权、旅游精准扶贫。

近五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1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市厅级科研项目 10 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省部级课题 2 项，市厅级课题 5 项；在《旅游科学》《西北大学学报》《预测》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23 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4 篇）；参编著作 2 部；参编教材 3 部。

序一

自1985年墨菲提出“基于社区的规划”方法以来，作为一种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社区参与”理论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与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研究者们更多的是将社区参与作为一种经济或技术过程而非政治过程，导致旅游发展由于无法跨越社区无权的本质鸿沟而举步维艰。正是基于对社区参与实践困境和理论不足的深刻洞察，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由于增权理论抓住了以往单凭主体能动性参与旅游进而导致社区参与乏力的症结，特别强调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使人们意识到社区参与的程度实际取决于社区自身与外部力量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权力较量。因此，要想实现旅游开发与社区发展的双赢，并进而达到社区与旅游的一体化发展，就必然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旅游增权”。

国内外关于社区旅游增权的研究时间都不是很长，目前基本都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尚未总结出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经验研究，及此基础上的理论升华，散见于具体案例地的旅游增权研究中。尽管围绕社区旅游增权的内涵、基础、内容、路径和目的等方面已经展开了诸多研究，几乎穷尽了社区旅游增权的研究主题，但在每个主题领域都尚存在不少理论问题急待深入研究。另外，以往关于社区旅游增权的实证研究，国外主要集中于乡村地区和生态旅游地社区，国内则多聚焦于西部地区民族村寨社区，以上类型旅游地社区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社区旅游失权问题在国内外其他类型的旅游地社区同样存在。例如，国外的土著部落社区，国内的历史街区和文化遗产地社区，当地居民在旅游业的发展过

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权问题。其中，在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失权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对于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来说，除了缺乏大部分景区周边社区所不拥有的旅游参与权外，还囿于文物保护政策的限制，甚至基本的经济发展权利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的需求尤为迫切。

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在对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状况开展深入调研以及对国内外社区旅游增权理论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因循“增权是什么”“凭什么增权”“增什么权”“如何增权”与“增权为什么”的理论脉络，围绕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内涵、基础、内容、路径和目的等问题，尝试建构了一套有关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系统理论。在此基础上，以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景区周边社区为例，基于多次深入的实地调研数据，对兵马俑景区周边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状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根据实际旅游增权状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旅游增权对策。

该书是基于社区旅游增权研究前沿展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作者作为青年旅游学者，在社区旅游增权研究方面不惮权威，敢于对社区旅游增权的隐含前提提出质疑，并尝试建构了关于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系统理论。希望作者能够在此领域耕耘不辍，为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研究贡献更多的知识。

是为序。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6月

序二

会战约我为其书稿《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理论与实践》作序，初始有些犹豫，原因有三：一是我自己也还属于学术研究的初涉者，资历与积累还远远不够，为同辈人的著作写序，总是有点“心虚”；二来，作为他博士后流动站科研工作的合作者，他的科研工作，我总是以建议者的角色出现，充足的合作贡献还远远不够，有些惭愧；三是作为居身遗产遍地的西安土著，虽对遗产有一点粗浅的认识，但深入的研究工作确实没有。序之，实有“畏惧”。但最终，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下这个嘱托，一则鞭策自己，二则互相鼓励！

如果说一个人真正懂得学术研究，会学术研究，我认为基本要在博士毕业以后，这种成长或者蜕变，需要脱离导师的“庇护”，直面科研工作的“惨淡”。唯坚守坚韧者，方能始获学术研究的甘甜，诚然，会战属于这一类坚韧者。从工学到管理，从管理到旅游，三次专业方向的转变委实艰难，面对诸多障碍与艰难，博士毕业当年即拿到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这在国内博士群体中也是少数。通常情况下，多数博士毕业就业者，有了这一初始积累，会选择短暂性休整，而会战则选择再次出发，进站继续寻求科研工作的增长点与发力点，这也是令我备感鼓舞与感动的地方。有这样的决心和耐力，相信他一定会在科研道路上长远而弥新！

回归本著作，其回应了遗产地旅游发展的现实与学科需要，初步明确了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基本学理与实践问题。作者对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现实状况和国内外社区旅游增权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围绕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内涵、基础、内容、路径和目的等问题，尝试建构一套有关文化

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系统理论，体现出一种经验世界和理论世界的互动探讨与螺旋上升，意欲在明理上推动遗产地旅游良益发展的达用。

为此，有感而发，谨以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陈国治' (Chen Guozhi).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6月

前 言

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困境和理论不足，使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旅游增权”成为必然。以往国内外关于社区旅游增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地、生态旅游地和民族村寨社区，这些类型旅游地社区一般都拥有旅游资源或其附着物（主要指土地）的所有权，但旅游失权现象在其他不拥有旅游资源或其附着物所有权的旅游地社区（如中国的文化遗产地社区）也大量存在，由此引发了作者对现有社区旅游增权前提的质疑。在此基础上，根据对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状况的实地调研和对国内外社区旅游增权理论的深刻反思，本书围绕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内涵、基础、内容、路径和目的等问题，尝试建构一套有关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系统理论。

本书首先界定了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概念；其次根据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结合国内外社区旅游增权的理论和实践，对现有社区旅游增权的前提提出了质疑，并由此引发了本书对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基础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建构了中国情境下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结构，开发出了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测度量表，从而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再次基于不同角度提出了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路径；最后明辨了社区旅游增权与社区参与的理论关系，认为社区旅游增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充分的社区参与，并探讨了社区旅游增权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理。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世界文化文化遗产——兵马俑景区的周边社区为例，利用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理论，并根据深度访谈资料和调研问卷数据，对其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基于

对其增权状况的研判与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旅游增权对策。

通过以上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是否受到旅游发展的负外部性”是社区旅游增权的基本前提,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既有其必要性也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第二,斯彻文思的社区旅游增权四维框架具有跨研究情景、跨旅游目的地类型的适用性,基于个体感知视角开发的中国情境下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第三,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路径的研究框架应是一个“三层次四维度多方式”的立体结构;第四,“社区旅游增权”和“社区参与”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权利意识在其间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第五,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因人口统计学特征、旅游分区和增权维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可采取按需增权、多方式增权以及自增权与他增权相结合的增权对策。

本书关于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研究的主要学术创新点包括:第一,提出并论证了“社区旅游增权的前提在于社区居民是否受到旅游发展的负外部性”的观点。以往国内外有关社区旅游增权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前提:即社区居民至少拥有旅游资源或其附着物(主要指土地)的所有权,但在中国情境下,由于特殊的产权制度安排,大部分类型的旅游地社区居民并不拥有旅游资源及其附着物的所有权,但旅游发展对他们的影响却客观存在,由此引发了本书作者对以往研究隐含假设的质疑和对新提假设的证明。第二,丰富了社区旅游增权的类型学研究。以往国内外有关社区旅游增权的研究鲜有涉及文化遗产地社区,而实际上旅游失权现象在文化遗产地社区普遍存在。由于受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或文物保护政策的限制,文化遗产地社区在旅游增权内涵、基础、内容、路径和目的等方面与一般旅游地社区多有不同,由此引发了本书对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理论的系统研究,拓展了社区旅游增权研究对象的类型。第三,开发了中国情境下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测度量表。本书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基于个体感知的视角开发了中国情境下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

增权量表，不仅在理论上克服了以往关于社区旅游增权状况定量测度的不足，使对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有效评价、历时追踪和共时比较研究成为可能，而且通过实际测试表明，本研究开发的测量工具对评估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状况具有实际应用效力。第四，明辨和验证了社区旅游增权与社区参与之间的“手段-目的”关系。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旅游增权”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替代，仅仅是一种理论的优化。从本质来看，“社区旅游增权”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手段；“社区参与”才是最终目的。本书基于这一假设构建了“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与其“参与旅游意愿”相关的结构模型，其中加入了“权利意识”这一极具中国乡土社会居民性格特质的元素作为调节变量，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著 者

2018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001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008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010
第四节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014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研究述评	015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015
第二节 社区旅游增权研究述评	021
第三节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研究述评	033
第三章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基础	041
第一节 社区旅游增权前提的破与立	041
第二节 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必要性分析	045
第三节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基础	053
第四章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内容	065
第一节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结构	065
第二节 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测度	083
第五章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路径	097
第一节 基于增权层次的路径分析	097
第二节 基于增权方式的路径分析	103
第六章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的目的	112
第一节 社区旅游增权与社区参与关系之辩	112

第二节 社区旅游增权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	115
第七章 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应用研究.....	136
第一节 兵马俑景区周边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研究.....	136
第二节 兵马俑景区周边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追踪研究.....	190
第三节 兵马俑景区周边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对策.....	198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206
第一节 研究结论.....	206
第二节 研究局限.....	209
第三节 研究展望.....	210
附 录.....	212
附录一：兵马俑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情况调查问卷.....	212
附录二：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量表测项编号（变量代码） 与调研问卷测项序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219
参考文献.....	220
后 记.....	234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在分析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书拟重点研究的四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清晰的研究思路与适当的研究方法,而这些问题是否真正值得研究以及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关系到本书创新之处能否成立以及创新之处的质量。以上构成了本章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研究背景

(一) 对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情况的调研所引发的思考

2014年1月,本书作者在对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以下简称兵马俑)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情况的初次调研过程中,一度曾被当地众多清一色的仿古民居、大量的旅游店面铺位和巨大的旅游客流所迷惑,推测当地大部分社区居民从旅游发展中受益颇多。然而在2014年7月,作者对此地进行深入调研后发现,以上现象对于当地许多社区居民来说更多是一种“表面的繁荣”“他人的幸福”,除了一些头脑灵活、学习能力强、拥有资金或权力资源的“社区精英”^①及其“社会关

^① 贺雪峰(2000)把村庄(社区)精英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在中国农村社会,传统型精英大致是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形成的村中精英,构成此类精英人物的条件往往来自某种既定的身份和品质以及他们个人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现代型精英大致是指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他们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在农村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系网络”^①获益于当地的旅游发展之外,许多当地社区居民囿于资金不足、技能缺乏抑或没有可资利用的关系资源,只能“望旅兴叹”。

进一步的深度访谈发现,近些年来,随着兵马俑景区空间范围的不断外延和拓展,周边部分社区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受到不同程度地挤压,其中因旅游占地导致的社区生产用地减少现象尤为突出。以紧邻兵马俑景区的山任村任五组为例,截至2013年下半年,全组人均耕地仅为0.11亩^②(1亩≈666.67平方米),“靠种地吃饭”的传统生存方式已难以为继,“靠旅游赚钱”的现代经营之道又不甚精通,大部分社区居民只好外出打工维持生计。2017年5月,作者再次深入兵马俑景区周边社区进行了追踪调研,发现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情况略有改善,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事实上,兵马俑景区每年数百万人次的游客所带来的巨大收益^③,主要是门票收入和各类税收,余下的旅游经营与服务性收入则有相当一部分以旅游“漏损”的形式为富于资金、精于经营、善于公关的外来旅游客商所得,而作为文化遗产地主人的社区居民,尽管为了遗产保护和景区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如旅游供地、社区搬迁、生产生活受限等),但不仅没有因此而实现旅游致富,反而由于旅游失地以及不得不为遗产的公共(社会文化)价值“买单”而导致生产和生活状态的不稳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区参与旅游乏力的现象?这一现象引发了作者对社区参与旅游实践困境和理论不足的思考。

(二) 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困境

① 费孝通(1947)在《差序格局》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推出去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中国农村社会,社区精英的地位和声望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人际关系来界定的,相较于一般社区居民,社区精英往往有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里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意指和社区精英有着各类私人联系的人群。

②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临潼区被征地村组耕地征收及补助情况汇总表(2013年下半年)[EB/OL]. http://www.lintong.gov.cn/zwgk_view.aspx?id=4820, 2014-01-07.

③ 根据内部资料,2011—2013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年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次(购票总人次)分别为527万人次(467万人次)、452万人次(401万人次)、455万人次(404万人次),按照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自2011年开始实行的淡、旺季浮动门票价格,即旺季150元/人次(3月1日—11月底),淡季120元/人次(12月1日—次年2月底),其每年门票收入达到数亿元。考虑到旅游业的乘数效应,每年所产生的旅游综合收入会更高。

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的大量实践表明,发生在兵马俑景区的上述现象绝不仅仅是个案。例如,目前丽江古城旅游业发展主要依托的是纳西族的民族文化优势,而参与主体却是基于地方政府组织、外来客商和当地少数精英形成的合作联盟,纳西族的边缘化趋势日趋严重(叶余旦,2012)。同样,在肯尼亚,生活在国家自然保护公园中的居民,虽然他们本身并不反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但却无力改变西方环境观和科学哲学思想主导本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事实,无法打破旅游发展收益主要为地方精英垄断和控制的局面(Akama,1996)。统观近些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及纳入西方研究者视野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①的旅游发展实践,并参考巴特勒(Butler,1980)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不难描绘出上述旅游地近乎相同的一段旅游发展历程:随着早期一小部分具有冒险精神的旅游者的到来,旅游地进入“导入期”;随之,旅游者逐渐增多,当地社区逐步进入“参与期”;在之后的“发展期”,当地大部分的旅游经营权逐渐从本地人手中转移到外来旅游企业的手上(谢彦君,2004);一直到“巩固期”甚或“停滞期”,这种状况都不会有太多改变。为什么在一地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外来旅游企业“喧宾夺主”的怪现状,进而使当地社区居民深陷参与乏力的困境?

(三) 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不足

社区参与旅游实践之所以深陷困境,追根溯源在于社区参与旅游理论的不足。自1985年墨菲(Murphy)正式提出“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或“基于社区的规划”方法以来,旅游发展研究中首次引入了“社区参与”这一概念(左冰,保继刚,2008),并在此后被广泛应用到国内外乡村地区(王云才,2002;Smith, et al., 1986)、民族地区(郭颖,2001;Caffyn, Lutz, 1999)和欠发达地区(潘秋玲,李九全,2002;Drijver, 1991)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旅游研究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旅游地在进行决策、规划、开发、管理和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保继刚,孙九霞,2006)。由于对社区利益的格

^① 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深受西方社会制度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

外强调,社区参与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旅游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左冰,保继刚,2008),但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对于大部分处于缺权状态的社区居民^①来说,“社区参与”往往成为一种对公共关系的虚饰,大多流于形式。究其学理原因,主要是由于研究者们更多的是将社区参与作为一种经济或技术过程,而实际上社区参与是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控制权的政治过程(左冰,保继刚,2008)。理论假设的失当导致概念解释的乏力,从而造成实践中社区参与由于无法跨越社区无权的本质鸿沟而举步维艰。

(四)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旅游增权”的必然性

正是基于对社区参与实践困境和理论不足的深刻洞察,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所谓增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Zimmerman, 1990)。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实质其实是权力的较量,因此除非对社区居民进行增权,否则社区参与将流于形式。这一认识触及了“社区参与”理论的根本缺陷,唯有通过理论创新,尤其重视对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的权力考量,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参与无力的困境。由于增权理论抓住了以往单凭主体能动性参与旅游进而导致社区参与乏力的症结,特别强调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使人们意识到社区参与的程度实际取决于社区自身与外部力量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权力较量。因此,要想实现旅游开发与社区发展的双赢,并进而达到社区与旅游的一体化发展,就必然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旅游增权”。

(五) 社区旅游增权理论研究急待深入

1996年,阿克马(Akama)在对肯尼亚的生态旅游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进行旅游增权的必要性,这是目前可得文献中关于国外社区旅游增权的最早研究。在国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2008年,左冰和保继刚将西

^① 在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的部分西方国家,凭依土地的所有权,社区居民尚且拥有与政府、旅游开发商进行抗衡的力量,但即便如此,它也仅只允许当地社区对即将实施的规划、计划、建议和发展在很小的范围内做出反应(Macbeth, 1994)。